

对当前日本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的反思

[日]饭田哲也

作者曾多次来华,通过深入中国社会实地了解和与中国社会学家及其他各行各业人员广交朋友,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化。在本文中,作者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对当前日本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随笔、游记到对中国的专门社会学调查与研究,分三类进行了分析。然后从方法论上深刻地指出了日本社会学界在对中国社会研究中现存的弊病。

作者:饭田哲也,男,1936年生,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

小 引

有位中国朋友说:外国学者在中国呆上一周就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呆上一个月可以写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但是如果呆上半年就不敢动笔了。我认为他的话切中要害。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那些对中国的轻率谈论,二是指对复杂多样的中国社会了解得越多越不敢妄论。1992年我曾在中国住过半年,亲身体会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结果当时什么没写出来。此后,1993年又在中国呆了3个星期,1994年呆了5个多星期,通过在中国各地与普通的中国人直接对话,我似乎看到了中国这一巨象的轮廓。不过,我的认识并未超出中国人的常识。我以为,要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生活的现状,至少要具有关于中国社会的常识。最近,日本关于中国的著作逐渐多起来,其中不少是描述中国的最新变化。我既无意于说这些论著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也不认为这些论著准确无误地描述了中国人的生活。譬如,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的日本留学生大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在中国的体验与在日本学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有很大的差别。由于大多数日本人尚不具备关于现代中国的起码常识,所以,那些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现实的论著也极有可能被误解。下面,我打算从社会学的角度就研究中国的课题提出几点看法。

一、日本人研究中国社会的一般方法

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有关政治或经济的宏观研究方法,仅就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特别是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整体图像”而言,日本人也是知之不多的。目前,日本关于中国人现实生活的介绍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报道性的介绍。着重介绍中国社会因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或引进市场经济而发生的剧烈变化,主要是些电视记者和新闻记者写的著作,也包括短期去中国旅行或出差的人道听途说式的见闻。许多日本人就是通过这些著作和见闻了解了中国最近的情况的。我的印象是,北京和上海等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确变化很快,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地方没有发生变化。以日本为参照,用一句笼统的话说,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汇集了日本战后50年的景观:一方面,现代化的高楼栉比鳞次,最先进的产品充斥于市,新建的百货商店的商品和气氛与日本的百货商店

相差无几,在城市的中心时常可以见到身着时髦服装的女性或带着大哥大以及BP机的人,富裕人家新买的家具和室内装饰与日本的家庭一样。另一方面,日本50年代或60年代前期的生活景观也可以在中国看到。类似日本过去的“黑市”式的商店街、在河中游泳的孩子们、交际舞的流行、日本60年代茶馆的气氛等等,都使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

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汽车的激增,交通阻塞年年都在增加。汽车的增加加上众多的自行车、三轮车和步行者,混在一起,就出现了在日本难以想象的交通状态。因此,建设新道路的工程在北京到处可见。在筑路工地上,一方面使用的是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利用了使用尖镐铁锹的人力。高层建筑的工地也是同样的风景。这是最“现代化”的地区之一北京所出现的“汇集”现象。倘若离开东部沿海地区,“汇集”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扩大。我在四川成都的郊外乘出租车,从车里观察的印象看,途中的风景恰似日本明治时代的气氛。如果说北京汇集了日本战后50年的景观,成都郊外则汇集了日本明治以来100年的景观。倘若再向西行,“汇集”的年限恐怕还会扩大。

第二种类型是随笔和游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类型的作品最准确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这些作者与下述第三种类型的人不同,他们会讲中文,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经验。他们的著作与第一种类型也不一样,对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描述得生动具体。但是,这类著作也有一种通病,即缺乏对中国社会整体的把握。另外,这类著作的作者写作时并未考虑到日本人会怎样理解自己的描述,他们对中国人的某些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的描述,时常令日本人感到是没有常识或难以忍受,尽管作者在书后附言说“这是因为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不同”,但还是仅给日本人留下了“坏印象”。

第三种类型的著作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写作的。由于这类著作是“专门研究”,所以只有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科中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阅读,读者的范围很窄。我读过其中的一部分,总觉得这类著作对中国现实的描述最不准确。我认为,由于社会学家研究中国还是个比较新的事物,因此,相对而言,很多“研究”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这类研究不仅不能回答第二类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而且,究竟是否把握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也疑问颇多。例如,某学者(及调查团)在日本社会学会上大会报告关于上海的生活调查时,有听众就上海家庭拥有浴室的比例提问说:“中国的浴室有四种,你所说的浴室拥有率是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浴室还是仅包括日本人所认为的浴室?”然而报告人却不明白提问者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恐怕是因为报告人(及调查团)并未见过中国老百姓的浴室是什么样,所以,一提起浴室,脑子里只想日本式的既有浴缸又有淋浴的浴室。还有一些“国际比较研究”是以日本人和中国人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这种调查表面上看似很科学,但是实际上,只有在中国人的生活现状与日本人相似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用同样的问卷。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日本社会学界有很多不懂中文却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然而却没有不懂英文而研究美国、英国等英语圈国家或不懂德文而研究德国的社会学家。这些学者大都仰仗中国留学生(主要是研究生)的翻译,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现状把握的程度。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过是依据统计资料、通过翻译从中国学者那里得到的知识以及英语参考文献,虽然不见得是错误的或违反事实的,但却是视野受到很大局限的东西。

简而言之,日本目前研究中国的动向具有这样的特点:相当多的著作不是仅描写因“现代化”而发生的激烈变化,就是只描写没有变化的部分,或者是依靠中国的翻译、导游、学者以及欧美的研究所得出的极其有限的“事实”的报告。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如何才能克服这种

局限性。

二、中国的庞大要求我们改变观念

“庞大”一词容易使人联想到数量的概观,但是“庞大”不仅仅表示巨大的统计数字,而且还意味着人们是怎样看待这一数量背后的事实的。如果我们这里仅以统计数字来说明中国的庞大,就会得出与前述第三种类型的著作大同小异的结果,没什么新意,仅依靠中国最近的出版物就够了。统计数字是举不胜举的,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数字与具体的生活现状和生活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改变自己通常的观念,就不会理解中国的某一数字或最近的“特征性”现象的真正含义。

中国的面积约是日本的 26 倍,人口是日本的 10 倍,这个粗略的数字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以日本人的一般感觉和标准是理解不了中国的庞大的。所以,我在向日本人说明北京的面积时说:“北京的老城区相当于日本的德岛县,整个北京市的面积与日本的四国差不多,内蒙古的大草原相当于日本全国面积的 1/3。”因为与列举具体数字相比,这种说法更容易使日本人有实感。同样,在向中国人解释新干线的速度时,与其说时速 200 公里以上还不如说从北京到上海仅需 6 个多小时更令他们感到吃惊,因为乘中国特快列车需要 17 个多小时。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1992 年我逗留中国时,日本曾报道了中国当时“集邮热”,然而我周围的中国人似乎对集邮并不关心,邮局里也没有特别畅销的气氛,在发行新邮票时也没出现日本那样的长队。真的出现了“集邮热”吗?我向一位中国朋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当即回答说“饭田先生忽略了中国的人口数量”。并问我“您总共观察了多少中国人?”我说“实际接触的人大约有 2000 人左右。”他又问“如果 1000 个人中有 1 个人收集邮票,那么整个中国集邮的人会是多少呢?”我一算是 100 万人,顿时感到无言以对,因为不要说有 100 万人集邮,就算是有 10 万人集邮,也可以说是一股小小的“热”了。前面提到的第一种类型著作的缺陷正在于缺乏这种人口背景,尽管这些著作所描述的事实无可置疑,但却未能正确地反映现代中国的生活。总之,在接触“多”、“广”、“远”这些词汇时,首先要弄清它所表述的究竟是数字还是比例或是中国人的感觉,仅以日本人的感觉来理解极有可能产生误解。

中国的庞大不仅体现在面积和人口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历史方面。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的历史感觉是从观看中国各省的博物馆获得的,仅在山东省博物馆就展示了 6000 年的历史。由此可见,联系中国的面积和人口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会使我们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国人生活的变化极其缓慢,其原因与中国的国民性密切相关。

以上关于“庞大”的若干分析虽然并未得出清晰的结论,但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倘若没有对“中国这一巨象”的宏观把握,无论什么样的事实描述都不会有超出简单的资料以上的意义。

三、关于生活差距的理解

人们常说,中国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引起了经济差距的扩大和物价的上涨。我认为,只注意物价的上涨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其没有上涨的一面。而且,中国物价上涨这件事是住在北京的知识分子说的,而日本人则是听来的。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各地的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店又了解多少呢?据我的观察,比起日本的知识分子对本国的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不

了解本国情况的人更多。因为在日本,同样的商品因为出售的地点不同而价格截然不同的情况相对少一些,而中国一件商品的价格差距则到了令日本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香烟为例,同样的香烟会因出售的地点不同出现 20% 至 80% 的差价。一套明信片,在不同的地点标着 1 元、5 元、10 元 20 元甚至 30 元以上的价格。我从农民手中花 40 元买到的手工艺品,在另一个地方卖 180 元,在北京的高级饭店里卖 500 元。

理解中国人生活的关键之一在于如何具体的理解物价上升和生活差距的扩大,弄清人口与生活差距的关系是其前提。大体而言,中国有近 10% 的人属于富裕阶层,他们的生活与其他阶层的生活截然不同,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犯大错。我还想强调的是,在研究中国人的收入时,不要把中国人的收入换算成日元,更不要简单地比较收入。换言之,要抛弃日本人关于经济生活的感觉。

近几年来,中国富裕阶层的收入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增长,过去一个时期曾以“万元户”来形容富裕的程度,现在对于富裕阶层来说,1 万元的收入已无足挂齿。1992 年我曾访问过四川的一位食堂经营者,问他月收入多少,他爽快地回答:2 万元到 5 万元。”另一方面,在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月收入只有 200 至 300 元或者不到 500。仅从收入的绝对额来看,其差距就比日本大得多。但是如何分析这种差距却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很难马上对这种现象作出结论。具体而言,中国的物价水平和生活费分配方式与日本显著不同,所以在研究时还是不把中国人的收入换算成日元为好。如果一定要换算成日元的话,就必须对中国标准的家庭收支结构有个大体的了解。例如在北京,多数家庭的情况是,房租只占 500 元收入中的 3 元至 20 元。以此来推论日本的家庭收支,即 50 万日元的月收入中有 3 千至 2 万日元的支出是房租,然而日本却没有这样便宜的房租;反过来,中国洗衣机的价钱却很贵,最便宜的也要 600 元,相当于一个老百姓一个月的收入。可见,把中国人的总收入换算成日元进行研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弄不好只会证明日本的物价特别是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过高。

另外,我们在研究中是否应该避免做简单的阶层和职业的比较,也需要进行慎重而详细的探讨。例如,中国大学教员待遇之恶劣,常常成为中日大学教师交流时的话题;也是了解中国人月收入的日本大学教师经常谈论的话题。按 1994 年的人民币对日元汇率计算,中国大学教师的月收入只有 6 千至 1 万 2 千日元,在日本的大学教师看来,这实在是太少。更令日本人感到不合理的是,一位初中毕业在饭店里工作的 20 岁的女服务员、一位初中毕业但有 8 年工作经验的 27 岁的食堂男厨师,一位 30 余岁的大学副教授,三个人的月收入都是 500 元。但是,如果我们从两个角度即阶层差异和各自 5 年或 10 年后的发展来考虑,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三个人的收入虽然一样,但是大学教师将来肯定属于前面的不到人口 10% 的富裕阶层(实际上,即便在现在,只要自己愿意做,大学教师也会从事第二职业、第三职业甚至第四职业迅速增加自己的收入);厨师若持有自己的店,通过努力再碰上好运,也可能进入富裕阶层;而饭店的女服务员尽管每天从上午 9 点工作到下午 6 点,但是除非碰上意外鸿运,否则很难跻身于富裕阶层。

四、日本社会学家研究中国的方法质疑

论述中国社会学的一本概论认为,1979 年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到 80 年代后半期已结束其第一阶段的发展而进入第二阶段。1994 年 9 月我从中国回日本之前,曾向中国的一位著名社会学家请教他对中国社会学近年发展状况的看法,他充满自信地说:“发展得很顺利,而且越来越

越快”。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又有些简单。尽管中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数、研究机构和组织的数量以及论文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但是研究水平却是参差不齐,尤其“重建期的一代”与其后的年轻一代之间有相当的差距,有关家庭、社区、大众传播各分支学科的著作的水平也是高低不一。尽管如此,中国人研究中国是对本国的研究,自有他们自身的课题,而日本人研究中国则是对外国的研究,必须确立独自の课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反思。

首先,在研究中国人的生活时,必须抛弃先入之见,特别是日本人的尺度。这里所说的日本人的尺度,在学者的场合,即意味着欧洲的尺度。目前,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日本社会科学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当然允许各种观点的存在,但是,我认为,那种把欧洲式的思维作为必要前提的方法需要从根本上加以纠正。日本社会学战前是靠引进欧洲的理论、战后是靠引进美国的理论发展起来的,我并不想否认日本社会学的整个历史,我想强调的是,这些“进口科学”的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日本或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什么才是研究亚洲的方法?怎样把欧美的方法和亚洲的方法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慎重地加以思考。

其次,还须注意不要以蔑视日本以外的亚洲人的意识来研究中国。仅就日本社会学界来看,不懂中文却来研究中国就是蔑视亚洲人意识的一种表现。例如,所谓的日中共同研究,有很多不过是把中国人作为本地人加以利用。中国人已经觉察到这一点,于是干脆利用日本人的研究经费来进行自己的研究。结果,某位日本社会学家愤怒地说:“一份问卷居然要了我10元钱!”而听者不禁要问:“你是不是净想着白利用中国学者了?”

如果我们日本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国时能够正确地描述事实,并能运用于中国人民有益的方法,就会通过这种研究丰富研究亚洲的方法。迄今为止,日本社会学界的国际比较研究中与欧美国家的比较相对较多,因此形成了偏重欧美思维方法的倾向,而通过与同属亚洲的中国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有可能探索出纠正这种偏向的途径。同时,这种研究也有助于日中两国社会学的发展。

结 语

近来,关于现代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題,日本社会流传着各种各样不负责任的预测或推测。不少预测是极其主观而且是充满恶意的,如预测中国会出现少数民族独立、农民造反、社会主义崩溃、国家分裂等等。

由于迄今为止的经济学一直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有无市场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的标志,所以,当中国要通过引进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些持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感到无法理解。实际上,只要改变那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固定不变的模式观点,就不难理解了。我在研究中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我认为可以从“混合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角度在理论上重塑现代社会主义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试验”的成败与否,将关系着人类未来的发展。

就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有人认为会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也有人认为会上强权道路,但我认为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即“混合经济”与“民主制度”的道路,这即是我对未来中国的预测,也是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

(张 萍 译)

责任编辑:范广伟